

致敬《白鹿原》 续写《大梁村》（上）

——一位后来者的创作思考

负文贤

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，我常常在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。《白鹿原》厚重的历史感、鲜活的人物群像与浓郁的地域风情，是我创作《大梁村》时汲取养分的重要源泉。陕西人民出版社曾这样介绍《大梁村》：“该书致敬和接续陈忠实先生的《白鹿原》，继续书写白鹿原上大梁村的故事”，并以“后白鹿原时代”予以定位。初闻这样的“文化联系”，我心中满是惶恐——致敬之心固然拳拳，但“接续”之心确实没有，因为我深知自己的差距，实实不敢。沉下心来梳理创作脉络，感到《大梁村》在多个方面都有学习借鉴《白鹿原》的印迹。下面，我想从六个方面谈谈创作感悟。

宏大背景： 熔铸历史，给人以大气和厚重感

《白鹿原》最令我叹服的成就，在于陈忠实先生将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巨变，巧妙熔铸进白鹿原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。从白嘉轩“六娶六丧”的家族悲剧到波澜壮阔的国内战争；从真实发生的“交农事件”“风搅雪”运动到日寇入侵的烽火硝烟，这些宏大历史深刻影响着白嘉轩、鹿子霖等人物的命运。这种将时代洪流与个体生命紧密缠绕的叙事，让整部作品散发着历史厚重感，每次重读都会引人深思。

《大梁村》展现的时代图景与《白鹿原》不同：从20世纪50年代的互助组、合作化运动，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建立；从市场经济浪潮对乡村的冲击，到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。半个多世纪的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，构成《大梁村》的历史背景。

如何将宏大历史融入作品？陈忠实先生的创作手法给了我启示，就是将宏大历史融入人物和故事之中。

譬如表现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生产生活，除了“开社员会”“龙口夺食”等集体活动场景描写外，更重要的是塑造典型人物，反映社会矛盾。为此我塑造了生产队队长

席广田这一典型形象。他常对社员们讲：“集体就是大家，大家都出力，经济就会壮大；都想给自己挖，集体就会垮。”这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动员和引导。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，他默默落了泪。这泪水，既有他对土地荒芜的痛惜，也有他对集体生产时代的怀念。

陕西人民出版社评价该书：“如果说《白鹿原》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，那么《大梁村》则可视为‘后白鹿原时代’现实主义乡土叙事的崭新历史坐标。”“作为农村改革变迁的一个缩影，在各个历史阶段中，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、强大的凝聚力、火热的战斗力和蓬勃的生产力。”

人物塑造： 在典型性格中感知人性的复杂与善善

陈忠实先生在《白鹿原》中塑造的人物群像，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的典范。白嘉轩挺直的腰杆里藏着宗法制度的顽固坚守；鹿子霖狡黠的笑容中透着权力欲望的膨胀；田小娥的悲剧命运演绎着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；黑娃从长工到土匪再到学者，直到最后被杀的人生轨迹，展现着历史洪流中个体命运的巨测沉浮。这些人物之所以不朽，就在于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，又展现出人性的复杂。

在创作《大梁村》的人物时，我铭记陈忠实先生“不将人物简单化”的思想，力求在典型性格中挖掘人性的复杂，但《大梁村》更多地弘扬了人性中的善善。举几个人物例子：

易建设：这是我自以为塑造得比较复杂的人物。在他身上，有精明能干的一面，有秉公办事讲政策原则的一面。但他最终在权力诱惑下逐渐迷失自我，走向腐败深渊。有人评论指出，这种刻画“高度契合现实逻辑和人物本质”，但与《白鹿原》中有撕裂感的黑娃、白孝文相比较，我感到还是“单薄”。

席广田：塑造这个人物时，我的脑海中常浮现白嘉轩的身影，但席广田又有截然不同的时代内涵。他不是宗法制度下的族长，

而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长。冷丁先生用“为人正大，善良谨慎，爱社如家，不谋私利，工作勤恳”概括他的性格特质。记得描写他带头修水库、创建砖瓦窑、进县城买麦种等情节时，我眼前就浮现出当年村里的王队长、张队长的身影。

于刚乾：作为核心人物，我试图通过他，向读者展现一位坚守理想信念的干部形象。为多打粮食，他带头抗旱打井，总结大梁村经验并在全公社推广，心系老百姓，坚持反腐败。这个形象曾被质疑过于理想化，但我努力通过生活细节等描写，想告诉读者：这不仅是人民的期盼，也是生活的真实；理想主义者的身影，从未离开现实生活的土壤。

后两个人物，我着力表现他们积极的价值追求。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评价：“翻开这部小说，你能看到生活的丰富，人性的复杂，更多则是领略到朴素人生的价值追求，和美善生命绽放的光彩。”

结构艺术： 确定适合自己的双线叙事架构

《白鹿原》的叙事架构堪称文学工程的典范——以白、鹿两大家族的命运为主线，将政治变革、家族恩怨、宗教信仰、民俗风情等多重元素编织成一张宏大的叙事网络，形成多线条、多层次、多寓意的“史诗迷宫”。这种高超的结构驾驭能力让我高山仰止。反复斟酌后，我决定从实际出发，采用更容易驾驭的“以线性叙事为骨架，以非线性叙事为补充”的结构形式。

《大梁村》的内容涵盖四个方面：社会治理的变迁、主人公的成长与蜕变、爱情故事的发展、地域人文历史的演变。如何将这四个方面内容有机整合而不显杂乱？

冷丁先生在评论文章中分析道，作者循着“线性”和“非线性”两种叙事方式展开创作。线性叙事：按时间顺序推进，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写起，

历经人民公社、改革开放，直至新时代的乡村振兴。这种时间轴式的呈现方式，确保了历史叙事的连贯性与完整性，让读者能直观把握乡村社会的变迁轨迹。非线性叙事：采用非时间顺序的叙述方式，包括插叙、倒叙等多种手法。其中“忆苦思甜”“童年回忆”“新仇旧恨”等章节，以及生产场景、文化习俗的描写，均在叙事主体中构成旁逸斜出的描写。作者运用线性叙事搭建历史骨架，又通过非线性叙事填充生活血肉，既继承了《白鹿原》的史诗追求，又适应了新时代读者的审美需求。

细节描写： 从乡土生活中找寻真实的历史印迹

陈忠实先生说过，“细节是文学的神经”。《白鹿原》中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细节，时常浮现在我脑海：白孝文在饥荒岁月中饿倒在土壕里，被野狗啃食脚后跟却因极度虚弱几乎没有反应；田小娥含冤死后，借庙三之口发出控诉：“大呀，我到白鹿村到底惹了谁了？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，也没揉戳过一个娃娃”；黑娃为田小娥复仇，一棍打断白嘉轩那象征宗法权威的笔直腰杆。这些细节如同锋利的刻刀，将历史的褶皱深深刻进读者心里。

创作《大梁村》时，我也不断提醒自己注重细节描写。比如写人民公社时期干部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场景：方副社长坐在小凳上端碗吃饭，一只芦花公鸡在灶火前刨食扬起阵阵灰尘，于刚乾随手用擤面杖打了一下，公鸡受惊后扇动翅膀飞到方副社长的头顶，方副社长的秃顶上留下了几个鸡爪印。

此外，我还着力描绘了诸多日常生活场景。通过这些日常情景，主要想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态和人们的面貌。这些努力被冷丁先生捕捉到了，他评价道：作品中展现的“乡村生活、耕读劳作、邻里交往、家族恩怨、男女情缘等世相百态，充盈着浓郁的生活底色，具有高度的真实性、生动性和时代性”。

洒向人间都是爱

雷涛

近日，老作家梦萌先生举办了“梦萌文学创作50周年座谈会”，意义深远，值得赞赏。在陕西，在古都咸阳，文学的追随者和无私奉献者还能为一位老作家，举办如此隆重的座谈会，说明陕西的文学根脉依然粗壮，良好的文学传统仍然在发酵，我们的文学队伍还依然挺拔。

人常说，陕西人的最大的优点是老实，而最大的缺点是“太老实”。对“太老实”三个字，我的理解就是三个“不”：不愿离开故乡故土在外边闯荡；不愿与外界交流沟通或戏称为“闷骚”；不愿大胆、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优长和与众不同，太过谦逊和低调。我觉得，这种现象在文学界也存在。但梦萌老先生不是这样，他身上散发着一一种“反叛精神”。具体说，就是挣脱了“太老实”的羁绊，表现出陕西人，尤其是陕西作家的不同性格与创造精神。梦萌老先生在文学实践上不但出道早，而且暮年时还在上海继续从事自己的神圣事业，并且取得新的艺术收获，这是很简单的事。据我所知，在上海生活并在文学创作中收获颇丰的有陈仓、李春平、王晓云等人，而梦萌老先生是先行者，就凭这一点而言，先生是敢于和善于“吃螃蟹”之人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品读老先生的作品，我总被一种爱的力量所打动、所冲击，从而倍增我对他作品的阅读快感。笼统地讲，他热爱生活，热爱文学。展开来讲，他爱祖国的山山水水，爱华夏的历史与现实，爱身边的人和事，爱过往的经历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当然，也爱家庭，爱子女。我常想，每个作家在创作时都有一股感情冲动，或悲愤，或激越，或惆怅，或迷茫。而梦萌老先生从年轻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爱河》开始，到新近结集出版的《梦萌文集》和《诗角》，变的是切入生活的视角、描写对象和写作方式，不变的还是一个“爱”字。况且，如今已年届八旬的他依然身体硬朗，精神矍铄，文学创作的劲头不减当年。梦萌老先生一生就是为爱而活。也因为爱，才有了他精彩的人生。

梦萌老先生的50年文学创作经历给我们的启示多多。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。

为“文学陕军”的崛起，发挥了链接和助推作用。人们习惯把“文学陕军”挂在嘴上，也写在文字里，不少耀眼的文学代表人物也被颂扬，这当然是我们陕西人引以为豪的名片，也于我们深厚的历史文明、地域文化悠长相映衬。然而，这背后如果没有庞大的文学创作队伍作为基础，作为一种烘托，甚至作为一个幕僚团体，冒尖的人物是很难涌现的。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创作氛围。无疑，梦萌老先生是这个链接和助推团体的优秀代表之一。从这一点讲，他既是一名优秀作家，又是一位“无名英雄”。

走出去进行省际间的文学交流，不但是文学自信的表现，也是互相学习与借鉴的好方式。梦萌老先生在这方面发挥着榜样的作用。北京聚集了一大批陕西文化人、文学人，并形成了一个不容小觑的文学现象，除了北京，陕西作家在外地安家、搞创作的就很少了。我特别欣赏老先生能以年迈之躯再闯文学“江湖”，到海派的中心地带——上海，开辟新天地。梦萌老先生不但在那里耕耘，而且和当地作家们能融为一体，又独树一帜，实属不易。

梦萌老先生的写作态度和创作精神有启迪和昭示作用。为文学立命，甚至为文学殉道是陕西文学人的一种精神坐标。路遥、邹志安、王宝成、红柯等作家就是代表人物。我们并不提倡“殉道”，但执着的文学追求精神却是值得弘扬的。梦萌老先生以80岁的高龄，仍然把文学创作作为生命之托和精神之重，为之奋斗到底，这种态度和精神令人动容。当下的年轻文学人，应该向他学习，让这样的文学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

文学和养生到底有无关联。梦萌老先生的经验已经作出了回答。过去，我们常听到一句话“文学可以养人”。有人赞同，也有人认为这是给自己解困，甚至认为这句话是心灵鸡汤，可以欣赏，但无实用价值。在文学养生方面，梦萌老先生肯定有说不完的体味和经验。莫言曾经说过，文学没有什么用处，比起自然科学，如造飞机、火车、轮船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发明创作显得很乏力。同时，他又说，好的文学作品在塑造人的灵魂，引导人们精神指向方面又产生着特殊作用。我是同意莫言后者的学术观点的。而他前面的观点只是随便调侃而已。

纵观陕西文学队伍，从“新文化”运动到现在，多数作家是为了精神追求，即试图通过写作充实自己生存意义的同时，也能最大限度的给读者以精神愉悦。换句话说，好的文学作品首先在于它的审美功能，其次才是教育和精神指向作用。

南书堂诗集《采芝歌》出版发行

本报讯（全媒体记者 杨志勇）近日，陕西诗人南书堂诗集《采芝歌》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采芝歌》是一部具有生活质感及诗学广度与深度的诗歌集。全书共153首诗歌，分为三辑：第一辑《可能性》，作者以悲悯苍凉之心寻觅天地万物的隐秘诗性；第二辑《推窗而见》，作者平静深沉地感知爱的无处不在与生命魅力；第三辑《采芝歌》，作者以广阔的视野，与自然对象对话，富有思辨地呈现物与人的关系。作品内容涉猎广泛，散发着浓烈的探索精神和现代意识，尤其是秦岭作为诗人的精神原乡与地理血脉，在诗中跃升为独特的诗学本体。诗集结构清晰，从自然观察到人文沉思，最终抵达历史和自然重构，完成从“风景”到“心灵”再到“灵景”的诗学飞跃。诗风兼豪迈、大气、庄严和细腻、飘渺、迷离于一体，沧桑中见风骨，平实中见奇巧，颇具深意和韵味。

南书堂，陕西商州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在《诗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数十家报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，曾获《诗刊》《飞天》等全国诗歌大奖。2014年获陕西作协年度文学奖诗歌奖。著有诗集《临河而居》《紫苜蓿》《漫步者》，部分作品被译介到海外。

诗集《一个矿井的记忆》或称“叙事组诗”。作者李永刚1983年大学毕业，分配到澄合矿务局权家河矿，他在这个以河和村庄命名的企业工作了12年。诗中写道：“我是子校一名年轻的/中学教师/陶醉于校园的/书声琅琅/我是矿上一名年轻的/机关干部/习惯了机关的/紧张紧张”。青春年少，又赶上改革时代，由此他的人生便有了那段“深深的记忆和长长的念想”。

尤为特别的是，这个“创造了无数辉煌的矿井”于2002年政策性破产。这是多么让人纠结、唏嘘的事情啊！许多不能忘怀的人、事和场景，时常撕扯和纠缠着作者，所以他一直有个想法——“用诗的表现方式忠实地把对权家河矿的所经所见所感，

以及珍存已久的情感写出来”。

2020年12月的一天，当作者打开澄合矿务局建局50周年画册的那一刻，内心深处那根最敏感、最脆弱的神经被击中了。于是他心潮澎湃，泪流满面，然后情不自禁，才思泉涌，“就从现在出发/完成一次梦想/让自己回到矿上的从前/和从前的矿上”。

这本诗集里的人、事、景、情浑然一体，交融共生。仔细阅读，诗情画意跃然纸上，曾经过往扑面而来。诗句深情温馨，激荡人心；富有哲理，回味无穷。譬如，“繁华落尽/人都离开了/东或者西/生或者死/如同飘零的落叶/或是天上远去的云朵/权家河依然安静地流淌/宁静的河水/流过了/一

个矿井轰轰烈烈的/岁月”。

除了一往情深外，作者还读到了“斑驳”。如北大沟的窑洞藏了不少故事，“这里的辉煌/已是从前的辉煌/这里的落寞/是后来的落寞/现在北大沟的人已经四散/窑洞空成了斑驳/坍塌成一片尘土/北大沟的/影子还在/成为记忆中的/河”。进矿的那座水泥桥也有类似的诗句，“如今，桥仍在/静静地成为斑驳的风景/成为多少人/心中的/一种挂念”。还有学校“走廊的标语已经斑驳”、车间“大大的标语/斑驳而又清晰”。最具代表性的诗句有，“邮电所实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/小小的情感驿站/温馨了热热闹闹的/矿上岁月/如今，一切不再/小小邮电所的/门/已经被砖和水泥/死死地封着/只

有被封的门之外/那斑驳的邮电绿/依然斑驳地绿着”。斑驳指什么？这里不是色彩错杂或不纯有瑕的意思，而是指那些过往岁月，那些褪了色仍记忆犹新的岁月，那些让人留恋也让人难过的岁月。

什么是好的诗歌？先不言古诗，仅现代诗就精彩纷呈。也正是这些诗句，属于自己，构成自己灵魂及生活的一部分。名家有这样的诗句流传，如艾青1938年创作的《我爱这土地》，其中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最是耳熟能详。

作者李永刚在后记中这样表白：“诗，是写诗者精神世界最恰当而美好的呈现方式。”诚哉斯言。

乡土、人性与叙事的交织

——读王卫民小说的几点体会

周养俊

认识王卫民的时间并不长，因为喜欢他的作品，所以对他有所关注。去年夏天，我去商洛采风，碰巧与他相遇，于是就得到了他的一本长篇小说集和一本短篇小说集。

商洛的作家比较多，我认为王卫民是比较独特的一个，因为他的小说独树一帜，特别是他饱含深情与冷峻洞察的写作特点，值得我们品味和学习。

王卫民是土生土长的商洛人，他爱商洛、写商洛，商洛这片土地是他文学创作的富矿，源源不断地为他输送素材，他的笔触深深扎根于这块沃土。王卫民一直聚焦乡村与城镇的动态关系，不是简单描绘田园牧歌，而是直面城市化浪潮下乡村的破碎与重塑。比如在小说《故里人物》中，曾经热闹的乡村集市，随着年轻人不断涌入城市，逐渐变得萧条冷落，传统手工艺人的技艺后继无人，那些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铁锅铲、裁缝店不得不关门。与此同时，村口新建起的工厂，又吸引着另一批人，他们试图在工业浪潮里谋求生计，新旧交替间的冲突与磨合，都被王卫民细腻捕捉。老一辈人对土地的眷恋、年轻人对城市霓虹的向往，他将这些元素交织碰撞，构成一部鲜活的乡村变迁史诗，提醒着我们，时代巨轮对地域文化、乡村

生态的碾压与重塑之力。

王卫民小说的叙事风格精准且冷峻。故事是他剖析社会肌理的利刃，摒弃过多个人情绪的渲染，以近乎零情感切入生活现场。在《叨着猪尾巴的笑》里，主人公狗剩一家在贫困的泥沼中苦苦挣扎，为了头猪的归属，家族内部矛盾丛生，人性的自私、狭隘暴露无遗。王卫民没有给予廉价的同情，只是冷静地铺陈事实，将农村生活暗处的丑陋、人性在贫困与欲望拉扯下的扭曲，毫无保留地曝光。开篇寥寥数笔，恶劣的生存环境便跃然纸上，“那间歪歪斜斜的土坯房，每逢雨天，屋内摆满了接雨水的盆盆罐罐，墙面被雨水冲刷出道道沟壑，像极了狗剩爹脸上的皱纹，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与生活的无奈”。后续情节推进中，苦难接踵而至，却不见他刻意煽情，那份隐忍背后，是对生命顽强底色的笃信，让读者在压抑中窥见曙光，这种叙事张力牢牢攥住人心，引人沉思生存本义。

王卫民写的小人物在他笔下熠熠生辉，成为时代群像的缩影。如“赤脚医生”丫丫，在《远去的乡村医生》中，她穿梭于乡间小道，怀揣着治病救人的理想，背着破旧却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的药箱，风里来雨里去。面对产妇难产，她心急如焚却又因缺乏专业设

备和经验，只能凭借土办法急救；遇到孩子半夜突发高烧，她不顾山路崎岖，摸黑赶路去救人。然而，在那个特殊年代，药品短缺、培训机会稀少，世俗的偏见认为“女娃子当什么医生”，种种困境横亘在前。透过丫丫的眼睛，我们看到特殊岁月里普通人的坚韧与迷茫，他们为温饱奔波，为尊严抗争，用微小却不屈的灵魂撑起生活的苍穹。王卫民赋予这些小人物以重量，使他们从历史尘埃中走出，成为可触可感的生命符号，映射出大时代下，个体命运的跌宕轨迹。

王卫民的语言简洁，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，文字如质朴的乡音，带着泥土气息，却又极具力量。在描述乡村宴席时，“大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香气直钻人鼻孔，四方木桌上摆满了大碗菜，绿的是青菜，红的是辣子，白的是豆腐。乡亲们围坐一团，吆五喝六，热闹得很”，短短几句，乡村的烟火气就扑面而来。而在触及社会问题时，又一针见血，如“村里的学校，教室的窗户玻璃破了几块，冬天的寒风呼呼往里灌，老师在讲台上讲着课，台下的孩子冻得直跺脚，可上头拨下来的修缮款，不知在哪个环节走了样”，刺痛社会暗疮。读来仿佛与一位老友对坐，听他讲述那些或暖心

或揪心的过往。不经意间，沉浸于对人生百态、社会万象的深度叩问之中。

王卫民在创作手法上大胆跨界，以现实主义为基，增添魔幻现实主义。在处理“猪”等意象时，突破常规逻辑，让其穿梭于现实与超现实的边界。在《猪馆的奇幻之旅》中，老猪馆养了一辈子猪，在一场大病后，竟能听懂猪的“语言”，猪们谈论着自己的命运，有的盼着早日出栏换钱给主人家孩子娶媳妇，有的抱怨圈舍太小施展不开。不同人物眼中，“猪”承载着各异隐喻。对于老猪馆，猪是他一生的陪伴与生计来源；对于村民，猪是财富的象征；而在孩子眼中，猪是既可可爱又神秘的玩伴。这手法似一面哈哈镜，扭曲又真实地反映出特殊年代的人性幽微、生存荒诞，讽刺与揭露之意尽在其中，拓展了作品意蕴空间，使简单故事有了深邃灵魂。

王卫民的小说，有独特的风格和韵味，是乡村挽歌，是人性探照，亦是叙事革新。他以笔为刀，划开生活表象，邀读者共赴一场对过往、对当下、对未来的深思之旅，在当代文学星空中闪烁着独属于自己的光芒，持续为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呈上宝贵的精神馈赠。